

# 导 论



近年来，随着中美之间实力差距的缩小和两国在国际制度、全球治理中呈现出的不同态势，有关中美两国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日益增加。这也给当前的中美关系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难题，即中美两国是否会重蹈历史覆辙，因国际关系中的主导权竞争而引发战争呢？对于美国而言，自冷战以来，掌控国际主导权历来都是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目标。为了维护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美国一向将实力与其接近的国家视为重要甚至是首要威胁，为此想方设法打压竞争对手。这也导致美国对华的战略施压逐渐增加，中美战略竞争日益激烈。对中国而言，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中国需要提升国际影响力，增强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权或亚太地区主导权。相对而言，目前中美两国在全球范围的主导权竞争主要是在金融、气候变化等部分领域有所显现。而在亚太地区，中美之间的主导权竞争更具综合性，在政治、经济、安全等诸多领域都有所体现。

中美在亚太地区的竞争日趋激烈，无论是政治领域围绕东亚峰会的竞争还是经济领域的RCEP与TPP，抑或是安全领域的亚洲新安全观与亚太联盟转型，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制度融合较少，而另起炉灶、相互竞争却日益激烈。这也导致出现了有关中美关系是否到了“临界点”争论。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两国之间的经贸摩擦持续发酵，两国关系深受冲击，更是出现了中美“脱钩论”的声音。有关中美关系未来发展趋势的研判不再是“临界点”的可能性，更多观点认为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已是大势所趋，不会因为美国领导人更迭而发生太多的改变。如此，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是否成为定局更是令人担忧。对于美国而言，继续维持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是确保其世界霸权地位的重要支撑；对于中国而言，从“地区大国”向“世界强国”转变需要加强地区影响力，获取一定的地区主导权至关重要。对于中美亚太主导权竞

争，探讨历史上的国际主导权竞争的经验、方式，对于理解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的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不无启示价值。

## 一、国际主导权竞争的历史演变

事实上，古往今来，国际关系中的国际主导权竞争从未停息。与西方国家探讨国际主导权竞争大多将“伯罗奔尼撒战争”奉为历史源头相比，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之间的不断争霸基本上也可以理解为久远年代的国际主导权竞争。基于对伯罗奔尼撒战争根源的分析，认为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实力差距缩小是重要原因，这也被艾利森称为“修昔底德陷阱”，主要是从权力转移、国际地位竞争等体系层面分析战争爆发的原因。不过这种观点忽视了当时希腊地区复杂的联盟政治、国内政治因素对于战争爆发的直接影响。<sup>1</sup>而春秋战国期间，诸侯的“盟主”地位竞争实际上也是“国际主导权”竞争，采取了“尊王”或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为一体的争霸战略，诸侯之间为了霸主地位也不惜发生战争。<sup>2</sup>

近代以来，国际主导权竞争更是屡见不鲜，其中英国与法国、德国、美国之间的国际主导权竞争更是一度成为学界探讨的热点。英国之所以在很长时段推行“光辉孤立”政策，对欧洲大陆事务要扮演“离岸平衡手”角色，其实质目的也在于维持英国的国际主导权。

英美霸权能够以相对和平的方式实现更迭，实际上也是两国国际主导权和平竞争的结果。对于英美霸权能够实现和平转移的原

---

<sup>1</sup> 凌胜利、吕蕙伊：《中美关系中的“修昔底德陷阱”：隐喻还是现实？——基于层次分析法的视角》，《统一战线学研究》，2018年第6期，第100-109页。

<sup>2</sup> 周方银：《松散等级体系下的合法性崛起——春秋时期“尊王”争霸策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6期，第4-34页；陈恩林：《论春秋五伯的争霸战略》，《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第4期。

因，学界主要是从权力空间错位、外交手段优先、同质文化等原因分析，认为这几种合力共同推动英美两国之间以和平方式完成了在美洲地区权力转移。<sup>3</sup> 不过英美霸权转移也并非没有摩擦，比如在太平洋地区，“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开始，美英在太平洋地区也曾出现过激烈竞争，其原因在于中太平洋的多个岛礁的权益竞争，导致了霸权转移的加速，更快促成了美国主导下的‘太平洋世纪’的到来。”<sup>4</sup>

而反观英德在一战前后的国际主导权竞争，方式却非常惨烈。德国的崛起打破了英国国际主导权护持所依赖的欧洲大陆均势，更为关键地是德国在发展海军上的激进态度危及了英国国际主导权的核心利益和基础。尽管一战前夕英德之间多次尝试缓解矛盾，不过都未能成功，最后导致双方不断寻求结盟对抗，最终以极为惨烈的战争方式来进行两国之间的国际主导权竞争。

冷战期间，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进行了全面且持久的对抗，实际上也是美苏之间的国际主导权竞争。时殷弘认为，“美苏意识形态对立与基本地缘政治环境中的超级大国利益竞争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决定性地促成了美苏冷战。”<sup>5</sup> 对于美苏双方而言，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美苏双方都将改造对方意识形态、政治制度视为重要目标，进而谋求国际主导权。不过由于两极阵营的对抗，冷战时期美苏双方都无法获得全球范围内的国际主导权，而只能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享有并不全面的国际主导权。美苏双方都将军事实

<sup>3</sup> 颜震：《英美在美洲权力和平转移的原因分析》，《史学集刊》，2013年第3期，第110页。

<sup>4</sup> 黄正柏、梁军：《从冲突到和解：近代英美关系考察》，《史学集刊》，2006年第5期，第36-46页。

<sup>5</sup> 时殷弘：《美苏冷战史：机理、特征和意义》，《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1页。

力、经济实力、政治制度推广视为国际主导权的重要基础，为此不断组建联盟体系。对于美苏的国际主导权竞争而言，双方在不爆发直接军事冲突的前提下，都是竭尽全力地削弱对手。

冷战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其国际主导权实现了地理空间的拓展。美国不仅在国际制度领域掌握主导权，而且对于关键地区的主导权也是极力维持。不过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和国际环境的变革所带来的去中心化、去权威化，使得美国感觉到其国际主导权有所下降，并将中国崛起视为重要威胁，由此也导致中美主导权竞争日益显现。

综上所述，国际主导权竞争是国际关系中的常有现象，大国之间因为国际地位、国际话语权等因素而不断展开竞争，成为国际主导权竞争的重要表现。

## 二、国际主导权：概念、基础与竞争原因

对国际主导权竞争进行探讨，需要对国际主导权的概念、基础和竞争原因有着相对清晰的认知，如此才能更好的理解与应对当前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

### （一）概念

“国际主导权”也被称之为“国际领导权”，主要是指对于国际事务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决策权、影响力和掌控力，与霸权相比，其也是国际关系中等级现象的体现，不过相对于霸权而言，其掌控力度稍逊一些。在本书当中，基本将“国际主导权”等同于“国际领导权”。

基于不同的理论视角，对于国际主导权的认知也呈现分歧，主要体现在国际主导权的基础、竞争方式等方面。“现实主义视角认

为国际主导权就是超强的国际控制权，国际领导权之争就是主导权之争；由此可见，现实主义对于国际主导权的理解具有浓烈的权力政治思维。理想主义视角则认为国际主导权是推动人类社会和世界政治向前发展的国际权威，单纯硬实力并不能自然转化为国际主导权，只有具备了一定合法性基础的最高国际权威才可能成为世界领导者。由此可见，理想主义视角对国际主导权的理解不局限于权力本身，还考虑了合法性的因素。”<sup>6</sup>

国际主导权是国际体系中的行为体依赖某种资源对整体性国际关系的组织、塑造和引导。<sup>7</sup>“阿里德·翁德达尔（Arild Underdal）认为主导权实质上是一种影响的非对称关系，其中影响力更强的一方会引导或指挥其他行为体的行为，由此形成的引领—追随关系形成是主导权发挥作用的关键。”<sup>8</sup>陈琪等认为，国际关系中的“leadership”概念具有领导地位、领导能力、领导作用等不同的表述。其中，领导地位是国家间权力排序的体现，也可成为国家对外政策所追求的目标；领导能力是领导作用的基础，不同的领导能力具有不同的资源动员和资源转换能力；领导作用是领导地位和领导能力的运用，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或机构通过不同形式实现对权力关系的调节。这三者在含义和指涉范围上略有差异，体现了领导权的

<sup>6</sup> 郭树勇：《全球治理领导权问题与中国的角色定位》，《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7年第7期（下），第26-28页。

<sup>7</sup> 李昕蕾：《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格局的变迁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1期，第69-70页。

<sup>8</sup> Arild Underdal, “Leadership Theory: Rediscovering the Arts of Management”. In W. I. Zartman (ed.) *International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 Approaches to the Management of Complexity*,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 Publishers. 1994, p. 178. 转引自李昕蕾：《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格局的变迁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1期，第69-70页。

不同维度。陈琪在其研究当中主要将“leadership”理解成领导权，但在具体分析过程中根据需要也交替使用领导作用和领导能力。<sup>9</sup>

也有学者认为，“国际主导权就是霸权国家（如美国）对国际体系的主导能力或者是相关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对国际事务议事日程的引导、掌握、处置能力。”<sup>10</sup>这一概念体现了国际主导权与国际制度、国际事务之间的关系，显示了国际主导权的需要体现在国际影响中的优势。不过国际主导权并不等于霸权，其主体、内容、手段以及对象会不断演变。国际主导权日益表现出多维度的特征，存在体系主导权、地区性的主导权、议题性或领域性的主导权等多种类型。<sup>11</sup>

国际制度领域的主导权一向是学界研究的焦点。“陈琪等认为主导权的存在是国际制度设计活动启动和维持的重要条件，并在制度设计的不同环节发挥着差异化的作用。”<sup>12</sup>如奥兰·扬将“制度性议价”过程的领导权区分为结构型、企业家型和智力型三类。

“结构型领导通过将物质资源转化为讨价还价的手段来影响制度的创设；企业家型领导通过谈判技巧来影响国际制度；智力型领导则主要依赖提供知识和信息来塑造参与者在议价过程中的预期。”<sup>13</sup>

---

<sup>9</sup> 陈琪、管传靖：《国际制度设计的领导权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8期，第16页。

<sup>10</sup> 戴维来：《中等强国的国际领导权问题初探》，《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6年第3期，第55页。

<sup>11</sup> 戴维来：《中等强国的国际领导权问题初探》，《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6年第3期，第55-58页。

<sup>12</sup> 陈琪、管传靖：《国际制度设计的领导权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8期，第4页。

<sup>13</sup> Oran R. Young,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Regime Form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stitution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5, No. 3, 1991, pp. 281-308. 转引自陈琪、管传靖：《国际制度设计的领导权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8期，第8-14页。

国际主导权也存在一定的分散性，不同领域可能存在相对独立的主导权，比如在货币领域的国际主导权。“国际货币权力本质上是一种霸权，获得国际货币领导地位的国家可以利用这种权力迫使其他国家达成其特定的目的。”<sup>14</sup>此外，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不同领域，国际主导权也相对分散，不同国家或社会团体能掌握一些特定领域的国际主导权。

不过也有学者对国际领导权表达了质疑。周方银认为：“一是需要思考国际领导权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是否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国际领导权竞争是否对于其他利益具有压倒性？还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从属于经济利益、安全利益的考虑？二是国际领导权是一个可见的、直接可争夺的东西，还是它是在领导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建构起来的東西？三是领导权是领导国家与承认其领导地位的国家之间一种稳定的关系建构，拥有体系中最强大的实力是一个重要的有利因素，但它并不是充分条件，有时甚至也不是必要条件。四是国际领导权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绝对零和性质的事物，而是有着颇为丰富和复杂的体现。”<sup>15</sup>这些对于国际主导权的质疑令人深思，在当前权力流散、规范增加的新的国际环境当中，要对国际主导权正在经历变革这一问题引起关注。

总之，国际主导权意味着对某个领域、某个地区拥有对一般国家更多的影响力、决策权等。不过随着国际关系的不断发展，国际主导权也日益多元化，对其展开竞争的方式也更加多样化。

---

<sup>14</sup> 刘壮：《国际货币领导权的国家特质：追随者视角》，《青海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第95页。

<sup>15</sup> 周方银：《国际领导权之争的误区与中美关系的前景》，《战略决策研究》，2018年第2期，第9-12页。



## （二）基础

对于国家而言，为了获取国际主导权，需要弄清国际主导权的基础及其影响路径。“阿里德·翁德达尔（Arild Underdal）认为，主导权来源是多样化的，权力、权威、联盟凝聚力、知识、话语、道义等均可作为其来源。而主导权的形成方式则需要一定的组织技巧、管理功能和协调治理。”<sup>16</sup>“约瑟夫·奈认为主导权是由三个要素构成的政治过程：一是领导者，二是追随者，三是它们互动的环境。这反映出特定的权力关系。”<sup>17</sup>陈琪等认为，“一个国家取得和维持主导权需有意愿、有实力、有行动三个基本要素。国际主导权存在的前提是其他相关国家有意愿接受领导，为了获得其他国家对其的支持，主导国家可以采取利益诱导、说服、威胁或强制等多种方式。”<sup>18</sup>

综上所述，国际主导权的基础主要源自主体、资源、互动三个方面。其主体涉及领导者与追随者；资源既源自物质方面的实力，也与权威、话语、规则等非物质资源密切相关；互动则意味着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要建立起联系，双方表现出领导与追随的意愿与行动。

事实上，国际主导权需要以一定实力为基础，不过其也面临着成本-收益的权衡。比较可观的国际领导权往往除了依靠实力外，也

---

<sup>16</sup> Arild Underdal, "Leadership Theory: Rediscovering the Arts of Management". In W. I. Zartman(ed.) *International Multilateral Negotiation: Approaches to the Management of Complexity*,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s Publishers. 1994, p. 178. 转引自李昕蕾：《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格局的变迁与中国的战略选择》，《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1期，第69-70页。

<sup>17</sup> Joseph S. Nye, *The Powers to Lead: Soft, Hard, and Smar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7.

<sup>18</sup> 陈琪、管传靖：《国际制度设计的领导权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8期，第16页。

与权威、国际制度等要素密切相关。以法德合作掌握欧盟主导权为例，权威在主导权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实力的变化比权威的变化更为迅速，权威的大幅度变化需经历长期的积累和塑造。不过在国际关系当中也存在借权威的现象，如德国在欧盟的主导权本来缺乏足够的权威基础，通过对法国妥协以换取合作，实际上也是从法国“借权威”，进而有助于增强德国在欧盟的主导权。”<sup>19</sup>

国际主导权并非自动形成，而是需要通过一些方式在主导国家和追随国家之间建立起关系。“基于国际制度视角，多数学者认为国际关系中的主导权存在于引导、协调和塑造国际事务的集体行动的过程中。为了实现国际主导权，主要方式有强制、议程设置和观念塑造，具体而言则有发起动议、指引目标、制定规则、设定议程等。”<sup>20</sup> 不过国际主导权并不限于国际制度领域，除了国际制度中采用的议程设置等方式外，也可以采取军事征服、结盟、利益协调、权威等多种方式，其目标在于形成“领导——追随关系”。不过在不同领域，领导国和追随国之间由于实力差异、战略分析、利益分化等多种原因，国际主导权的成本、效果等也千差万别。

### （三）竞争原因

国际主导权竞争为何会出现？在现实主义看来，主要是国家之间的权力竞争所致。沃尔兹认为，“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大国内在的攻击能力、他国意图的不确定性和大国对生存的理性追求决定了大国必然为自己的世界权力份额最大化而相互竞争，因为权

---

<sup>19</sup> 熊炜：《“借权威”与妥协的领导——德法合作的欧盟领导权模式》，《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6期，第30-35页。

<sup>20</sup> 陈琪、管传靖：《国际制度设计的领导权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8期，第16页。

力是确保安全的终极手段。由于巨大水体的阻遏力量，各大国主要致力于谋求地区霸权地位，并努力阻止其他大国成为地区霸主。”<sup>21</sup>从现实主义视角分析国际主导权竞争不得不提“修昔底德陷阱”。对于“修昔底德陷阱”最常见的理解是国家之间的权力转移导致彼此之间为了国际主导权而展开竞争。不过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以往对于修昔底德陷阱的分析更多关注权力竞争，对国内政治缺少关注，贫富分化与城邦共同体的裂变、精英的衰败与混合政体的崩溃等被认为是导致雅典与斯巴达两极力量对抗的主要动力。更有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所谓‘战争的必然性’实际上是一个可被质疑的命题，而不是一种被普遍认可的事实，它很有可能只是修昔底德一人的观点。”<sup>22</sup>历史学者认为修昔底德对历史存在误解，其只是强调了自己认为的最重要原因。<sup>23</sup>姑且不论修昔底德对历史的认知是否客观，将修昔底德陷阱套用于中美关系也令人质疑，其理论依据权力转移和安全困境被认为在中美之间并不适应。<sup>24</sup>总之，在现实主义看来，国际主导权之争源自国家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在国家之间实力差距缩小的情况下，大国之间的国际地位竞争会加剧，也就促成了国际主导权竞争。

自由主义则认为国家之间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分歧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国际主导权竞争。“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和不同的政治制

---

<sup>21</sup> 李永成、张妍：《进攻性现实主义视角下的大国权力——安全竞争》，《太平洋学报》，2004年第3期，第23页。

<sup>22</sup> 吴晓群：《公元前五世纪中叶的希腊城邦政治与“修昔底德陷阱”》，《史学史研究》，2017年第4期，第9页。

<sup>23</sup> 何元国：《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原因论探微》，《历史研究》，2017年第6期，第126页。

<sup>24</sup> 吴志成、王慧婷：《“修昔底德陷阱”对中美关系发展的非适用性分析》，《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1期，第15页。

度选择导致大国间的冲突乃至战争。”<sup>25</sup> 以美苏冷战为例，美苏之间对立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也被认为是根本原因，由此也导致美苏不断组建联盟体系进行全面且持续的对抗。时至今日，美国之所以将中国视为重要威胁，也与两国之间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存在差异有关。美国为了自身的霸权地位，追求一种“绝对安全”，只有政治制度与美国趋同，意识形态与美国一致的国家才有可能不被美国视为“威胁”。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从认同政治的角度探讨了国际主导权竞争的原因，这也意味着国家之间的政治差异会成为国际主导权竞争的重要根源。

无论是权力竞争还是意识形态或制度竞争，都是国际主导权竞争的原因。不过从历史长时段来看，权力转移催生国际主导权竞争似乎更为明显。这是因为权力往往是国际主导权的重要构成基础，大国之间权力转移势必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国际影响，也会导致国际主导权竞争。

### 三、国际主导权竞争的主要方式

对于历史上的国际主导权竞争而言，战争方式是主流，除此之外也不乏英美之间的国际主导权的和平转移和大国协调等方式。艾利森指出，历史上的16次大国崛起中，其中12次出现战争，由此也得出“修昔底德陷阱”的论断。在国际规范有限、权力积累主要依靠物质力量的时代，战争成为国家间竞争的主要方式。纵观“三十年战争”以来的国际关系，大国之间围绕着国际主导权的竞争而采取战争方式并不少见。无论是早期的法国与西班牙，还是英法百

---

<sup>25</sup> 钮汉章：《相容：超越零和的有序竞争——政治发展视角下的21世纪大国关系走势》，《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年第5期，第79页。

年大战、法德战争，都是欧洲强国基于欧洲主导权而展开的惨烈竞争。一战和二战也是大国之间通过战争方式竞争国际主导权的显著体现。冷战时期，美苏虽然并未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但代理人战争和边缘战争危机却多次出现，也反映了冷战时期美苏双方并未超越以战争方式竞争国际主导权的路径。

国际主导权竞争的和平方式比较少见。对于英美之间的国际主导权能够和平转移的原因，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经济相互依赖，认为英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加深抑制了双方之间的战争冲突。不过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英美双边贸易量的绝对数字虽然逐年增长，但其占各自对外进出口总量的比重却呈现出波动不定、总体递减的趋势。”<sup>26</sup> 由此也很难推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英经济关系上的相互依赖变得更加紧密，并因此导致了政治上的接近与和解。二是美国尚未危及英国的核心利益——海上霸权和欧洲均势。相对于美国而言，德国崛起对英国的核心利益造成的冲击更大。美国拓展“相容利益”实现英美权力和平转移，德国偏向“狭隘利益”容易引发国际战争和体系冲突。<sup>27</sup> “威廉二世高估了本国的实力，将德国的目标从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上升为全球性的霸权地位，直接挑战英国的霸权地位，导致英德之间出现核心利益冲突。”<sup>28</sup> “克劳则认为德国在当时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的同时还要发展海军，这大大降低英国有效干预欧洲大陆均势失衡的能力，突破了英国所能

---

<sup>26</sup> 黄正柏、梁军：《从冲突到和解：近代英美关系考察》，《史学集刊》，2006年第5期，第37页。

<sup>27</sup> 赵斌：《“利益相容”与新型国际关系建构——英美、英德关系（1898—1945年）的历史镜鉴》，《欧洲研究》，2017年第3期，第20页。

<sup>28</sup> 宋伟：《联盟的起源：位置现实主义的分析——以一战前的英德联盟战略为例》，《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7年第1期，第35—36页。

容忍的底线，被英国视为重要威胁。”<sup>29</sup> 美国的崛起并未给英国带来急剧的冲击，地理距离的遥远以及双方之间的不断协调，缓冲了英美之间的利益冲突。三是英美两国在血缘、文化价值上的相似性以及民主的认同也是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催化剂。<sup>30</sup> 从民族、语言、文化和价值观等角度来看，英美之间确实存在很多共性，不过这是否导致英美之间的权力冲突缓和呢？对此是见仁见智，有学者认为，英美“特殊关系”得以延续，主要是基于双方共同战略利益而非单纯的文化因素。<sup>31</sup>

除了英美国际主导权竞争以相对和平的方式转移外，大国协调的方式也被认为区别于战争方式的国际主导权竞争方式。“大国协调是大国共同管理国际冲突与危机的一种多边安全机制。它主要通过会议外交和协商、共识来决策，并依据一致性、合法性、责任性、包容性和自我克制等共有规则与规范行事。”<sup>32</sup> 通过大国协调方式，可以缓解大国之间的国际主导权竞争。二战后法德之间的和解实际上是两国国际主导权竞争化解的重要路径。法德和解与两国的国内政策调整和冷战的对抗的国际环境不无关系，而两国之间采取大国协调的方式来处理彼此间的分歧具有重要影响。冷战后，大国协调的作用更加明显。“如中亚地区在冷战后因权力格局变化，成为大国竞相关注的战略区域。在中亚各国国力有限的情况下，通过

---

<sup>29</sup> 吴征宇：《〈克劳备忘录〉与英德对抗的起源》，《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2期，第55页。

<sup>30</sup> 黄正柏、梁军：《从冲突到和解：近代英美关系考察》，《史学集刊》，2006年第5期，第37页。

<sup>31</sup> 冯梁：《英美特殊关系：文化基础与历史演变》，《欧洲》，2002年第4期，第78页。

<sup>32</sup> 郑先武：《大国协调与国际安全治理》，《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5期，第49-65页。

大国协调加以应对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行性。中美俄大国协调是一种重要思路。”<sup>33</sup> 甚至在大国博弈异常激烈的东北亚地区，大国协调作为重要的协调机制对于管控地区安全分歧，应对地区安全危机也具有积极作用。<sup>34</sup> 对于中美之间的主导权竞争，大国协调也被视为重要缓解手段。有学者建议可以采取亚洲大国协调的方式，进而培育新型的复合地区主义，有助于缓和中美之间的战略冲突。<sup>35</sup>

从历史经验来看，国际主导权呈现和平竞争方式的可能性在增加，制度竞争作为大国国际主导权和平竞争的重要形式日益明显。其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国际主导权对于军事力量的依赖性下降，通过战争方式来角逐国际主导权的可能性下降；二是国际规范不断增加，约束了国际主导权竞争的烈度，相对温和的制度竞争成为国际主导权竞争的主要方式。大国可以采取武力胁迫或利益交换的方式来增强国际影响，但目前越来越多地依赖利益协调的方式。

“导致这种权力竞争方式出现变化的最关键的条件是体系中存在抑制大国剥夺小国自主性的社会规范。规范约束性越强，大国越难以采取威力胁迫的方式来增强国际影响，获取国际主导权。”<sup>36</sup> 三是各国之间的联系密切加深，导致国家之间建立“领导——追随”的要求更为复杂。目前，提供公共产品也是大国国际主导权竞争的重要手段。“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方可获得同时作为消费者和供应方的

---

<sup>33</sup> 曾向红、杨双梅：《大国协调与中亚非传统安全问题》，《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7年第2期，第43页。

<sup>34</sup> 韩爱勇：《东北亚大国协调与复合型安全合作架构的建立》，《当代亚太》，2013年第6期，第30页。

<sup>35</sup> Baogang He, “A Concert of Powers and Hybrid Regionalism in Asia,”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7, No. 4, 2012, pp. 667-690.

<sup>36</sup> 杨原：《大国权力竞争方式的两种演化路径——基于春秋体系和二战后体系的比较研究》，《当代亚太》，2014年第5期，第4页。

双重回报。国家可以将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作为主导权竞争的手段，这也导致国家基于主导权竞争，在国际公共产品提供方面展开竞争，目前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公共产品提供便是显著体现。不过公共产品供应的地理性竞争极可能是零和性质的，而领域性竞争则未必如此。”<sup>37</sup>

#### 四、中美主导权竞争的浮现？

回顾美国霸权的历程，美国实际上是被动走上霸权之路。美国虽然在20世纪初经济崛起，但却两次拒绝领导世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王立新认为，“与美国独特的地缘政治位置、分权制衡的外交决策体制、以自由为核心的国家传统和清高自傲的自我形象有关，其中孤立主义者对充当世界领袖可能付出的代价的担心和警告，是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不愿意领导世界的最重要原因。”<sup>38</sup>对于美国而言，实力和意愿是其国际主导权能够得以实现的条件。在过去很长时期，美国的霸权地位基本稳固。“美国的霸权地位得到了安全结构、生产、贸易和金融结构以及知识、观念和制度结构的有力支撑。为维护 and 巩固全球霸权特别是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对他国实施了‘系统内分权’和‘责任分担’战略。”<sup>39</sup>在美国的霸权支撑当中，经济基础和国际制度被认为最为重要。

“美国霸权依赖于美国经济的全球主导地位。冷战后中国经济发展致使美国掌握和动用国际经济资源的能力减弱，美国经济实力

---

<sup>37</sup> 张春：《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竞争及其出路——亚太地区二元格局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当代亚太》，2014年第6期，第57-60页。

<sup>38</sup> 王立新：《踌躇的霸权：美国获得世界领导地位的曲折历程》，《美国研究》，2015年第1期，第10页。

<sup>39</sup> 李晓、李俊久：《美国的霸权地位评估与新兴大国的启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期，第114页。



在相对下降，不过这一转变过程会比较漫长。”<sup>40</sup> 美国认为维持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优势有助于其霸权地位护持。为了巩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领导地位，美国基于自利需求和战略需要不断交替使用单边和多边主义政策，试图继续维持霸权治理模式。<sup>41</sup> “考虑到中国作为潜在挑战者的极大可能性和美国霸权衰落的不确定性和长期性，美国中长期战略更可能通过确立一个战略目标区间来有效应对霸权衰落。”<sup>42</sup>

美国除了通过维持经济实力来进行的国际主导权维护外，巩固和增强美国在国际制度中的优势也是确保美国国际主导权的重要方式。“国际体系的变革不只是表现为大国地位的升降，更体现为一个历史长时段中主导制度模式、价值观念、原则规范的变化。国际体系变革中的大国竞争，实际上也是一场制度模式的竞争。”<sup>43</sup> 由于制度具有非中性，通过一系列国际制度不仅有助于维护国际主导权，也有助于美国以相对温和的方式来维持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领导——追随”关系。现有的重要国际政治经济制度基本都是美国在二战后主导创建的，也在很大程度上维持了美国的国际主导权。不过随着国际实力对比的变化，美国在一些国际制度中的主导权遭到冲击。这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重要的国际制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由此也引发了美国对于自身国际主导权的担忧。中国近年来在国际制度改革与创建中积极进取，主导创

<sup>40</sup> 宋国友：《美国霸权衰落的经济逻辑》，《美国研究》，2015年第1期，第54页。

<sup>41</sup> 程永林、黄亮雄：《霸权衰退、公共品供给与全球经济治理》，《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5期，第144页。

<sup>42</sup> 潘亚玲：《应对霸权衰落：美国中长期战略前瞻》，《美国研究》，2013年第2期，第45-53页。

<sup>43</sup> 陈玉刚：《制度创新、大国崛起与国际体系变革——比较政治与国际关系交叉研究的视角》，《国际观察》，2013年第4期，第25-31页。

建了亚投行、丝路基金、澜湄合作新制度，但也有一些与既有国际制度存在功能重叠、区域重合等情形，新旧制度之间不乏矛盾，也导致“竞争性多边主义”，<sup>44</sup>中美之间出现了“制度竞争”或“制度制衡”。

当前的中美关系被很多学者认为与一战前夕的英德关系非常相似。“中国与一战前的德国一样，是一个正处于崛起过程中的大陆国家；美国则与世纪之交的英国一样，是一个与大陆保持着密切政治经济联系的海洋强国。”<sup>45</sup>中美两国是否会爆发战争令人担忧，不过相对于战争这样激烈的竞争方式而言，中美之间的国际主导权竞争在部分区域或领域有所显现。

一是在经济领域，随着中美两国经济实力差距的缩小，两国的国际主导权竞争显现。“中美两国经济总量的差距缩小预示着全球经济体系将不再完全以美国为核心，而是将出现中美双核并存局面。中国因所积聚的经济资源会增加而导致国际经济影响增强，势必会冲击美国在全球经济的主导权。”<sup>46</sup>不过中美经济实力的差距缩小未必是线性发展，其间会经历曲折复杂的博弈过程，“中国需要增强战略耐心和战略定力。中国不仅要增强综合国力，也要善于借助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和平台，通过非零和博弈将日益增长的综合国力不断转化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制度权力、塑造力和影响力。”<sup>47</sup>不过要增强中国在全球经济领域的主导权并不容易。“在

<sup>44</sup> Julia C. Morse and Robert O. Keohan, “Contested Multilateralism”,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9, No. 4, 2014, p. 385.

<sup>45</sup> 吴征宇：《〈克劳威尔备忘录〉与英德对抗的起源》，《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2期，第44页。

<sup>46</sup> 宋国友：《美国霸权衰落的经济逻辑》，《美国研究》，2015年第1期，第63-64页。

<sup>47</sup> 程永林、黄亮雄：《霸权衰退、公共品供给与全球经济治理》，《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5期，第148页。

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演进中，中国有意愿但尚未有足够的能力成为全球金融治理的‘引领者’，‘中国方案’由内及外走向世界还须解决制度性金融权力、中长期议程制定能力等一系列难题。”<sup>48</sup>由此可见，中国在国际制度领域不断增强影响力，被美国视为战略挑战，危及其国际主导权。

二是在亚太地区。对于中国而言，提升在周边地区的影响力至关重要。不过中国在周边地区却面临着崛起困境。“中国因实力地位崛起逐步成为可能推动国际体系格局转变的重要因素，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也随之逐步显现，如何缓解崛起困境，既要维持国家实力上升，又要尽可能降低体系安全压力的两难局面，成为中国外交难以回避的重要难题。”<sup>49</sup>在亚太地区，中美之间的利益交织最为密切，竞争也日益激烈，这也使得中美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竞争逐渐出现。尽管中美两国尚未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主导权竞争，但在亚太地区，两国之间的主导权竞争却逐渐体现在政治、安全和经济领域。在政治领域，围绕着东亚峰会的竞争折射了中美双方对于亚太地区合作方向的分歧；在安全领域，无论是地区安全合作制度还是地区热点问题，中美之间的态度迥异；在经济领域，围绕着APEC改革，TPP和RCEP的竞争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中美的国际主导权竞争。由此可见，中美亚太主导权日益显现。

总体而言，中美之间由于实力差距缩小，美国对华战略防范则不断加重，中国对美战略能力和战略自信都有所增强，中美两国的主导权竞争日益浮现。从中美两国领导人和学者的观点来看，中美主导权竞争目前主要聚焦在亚太地区。美国方面是非常关注其全球

---

<sup>48</sup> 张发林：《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演进：美国霸权与中国方案》，《国际政治研究》，2018年第4期，第9页。

<sup>49</sup> 孙学峰：《崛起困境与冷战后中国的东亚政策》，《外交评论》，2010年第4期，第142页。

和亚太地区主导权，认为中美亚太竞争具有很强的结构施动性，主要与中美两国的结构性权力冲突有关。因而无论是从中国实力增强还是地区权力格局变动来看，中美亚太地区主导权竞争已成为一个逐渐显现的问题。对于中国而言，认为国家意图和政策可以改变中美主导权竞争的宿命。尽管中国的意图是要规避这一问题，但显然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很难以中国单方面的意志为转移。近期中美两国尚未在全球领域展开主导权竞争，而是主要聚焦在亚太地区。随着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竞争不断显现且影响增强，对此进行研究也很有必要。

## 五、篇章结构和主要观点

本书主要研究中美两国对于亚太地区主导权竞争的认知，构建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的战略互动模式，重点分析美国的亚太主导权战略，研判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的趋势及其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一些对策或建议。本书的篇章结构主要分为以下六个部分：

一是比较分析中美双方对于亚太地区主导权竞争的认知。近年来，随着中美实力差距的缩小，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才逐渐凸显，未来其对于中美关系和亚太地区的影响如何，中美两国存在不同的认知。通过比较分析中美两国对亚太主导权竞争的客观性、主要原因、基本逻辑、主要内涵和可能影响的认知，可以较为全面地把握两国对于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的认知，实现战略分析上的“知己知彼”。

二是构建中美亚太地区主导权竞争的战略分析框架。目前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各具优势，不过由于中美战略互信程度较低，短期内两国想实现战略谅解并非易事。在和平竞争的基调下，中美采

用何种战略来获取或维护亚太地区的主导权值得关注。本书创新性地提出了“拒优战略”的观点。结合当前大国竞争的主流趋势，分析中美两国的战略选择，基于中美两国对于亚太主导权竞争认知的比较分析，构建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的战略分析框架，将其界定为拒优战略，即在不发生战争冲突的前提下，中美两国会尽可能地阻止对手获取主导权竞争优势，以此把握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的战略目标、资源、手段等战略要素。<sup>50</sup>

**三是重点分析美国的亚太主导权战略。**美国在当前的亚太主导权竞争当中处于优势地位，其亚太主导权战略的目标主要在于避免过快地丧失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战略资源来自自身和诸多盟友、伙伴，战略手段具有多样性。美国是亚太主导权竞争的重要主角，通过对其亚太主导权战略的环境、目标、资源、手段、影响等战略要素进行深入分析，能够较为全面系统地把握美国亚太主导权战略。

**四是对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的案例分析。**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涉及政治、经济安全等诸多领域，通过选择典型案例，有助于加深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的理解。政治领域主要关注中美两国对亚太地区合作机制特别是东亚峰会的竞争，经济领域则聚焦TPP与RCEP、FTAAP的竞争，安全领域主要分析中美之间在亚太地区的安全观念、议题、伙伴等的竞争。

**五是探讨亚太国家对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的认识与回应。**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对于亚太地区新秩序构建具有重要影响，亚太国家如何认知这一问题以及做出何种回应值得分析。对此需要对亚太国家进行区分，探求不同类型国家对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的态度，分

---

<sup>50</sup> 凌胜利：《拒优战略：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当代亚太》，2017年第1期，第109-138页。

析这些国家战略选择的原因，结合具体案例分析，加强对亚太国家在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影响下的战略选择及其影响的研究。对此一是分析了美国亚太盟国应对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在“双重困境”之下基本采取动态平衡战略。二是以东南亚国家为例，分析2012-2017年期间其对于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的认识与回应。

**六是总结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的影响并提出中国对策。**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是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缩小的产物，对中美关系、亚太合作都会产生重要影响。探讨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的主要趋势，分析其对于全球、地区和双边关系都具有重要影响。基于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战略的分析，重点关注其对中美关系、亚太地区各国、亚太地区合作等的重要影响，有助于更加清晰地理解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对于中国的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地区关系等的多重影响。尽管中国并未明确宣称或获取亚太地区主导权，但中国对国际地位提升的期盼已日益明显。美国基于地区主导权的维护，将中国视为重要挑战对手，加强了对华战略防范的一面，中国在寻求和解无望的情况下也要妥善应对。在对美国亚太主导权竞争战略有所了解的基础上，中国应该制定较为合理可行的应对战略，对战略目标、资源、手段、影响等战略要素进行深入分析，探讨两国战略互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总之，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深受两国实力对比、战略导向和政策选择等因素影响，是近年来才在中美关系中凸显出来的重要问题，并将至少影响未来数十年的中美关系走向和亚太地区局势。通过对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了解中美亚太主导权竞争的原因、内涵及影响，进而谋求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促进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和平共处。